

变迁时代的生命历程、人生转折与心理嬗变 ——“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口述史与集体叙事*

胡 洁¹ 周晓虹²

(¹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南京 211189) (²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南京 210023)

摘 要 改革开放 40 年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朝向现代化的迅猛变迁。在经济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并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的同时, 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嬗变。1979 年中国社会学重建后, 作为对社会变迁及其影响最为敏感的群体, 知青一代社会学人, 因其个体生命史与改革开放同构及与社会学重建同步, 成为表征转型时代心理蜕变的合适案例。就个体心理蜕变的向度说, 转型或变迁影响到他们的认知方式、情感世界和个体行为的现代性; 而就集体心态建构的向度说, 他们在 40 年的职业生涯中,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富民实践、遂生乐业的心态秩序、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等议题所形成的话语叙事, 都充分体现了这个独特群体在大变革时代的集体心态。进一步, 在个体心理蜕变和集体心态建构之间, 存在着多种重叠与共通的部分, 它使得知青社会学人在变革时代的心理嬗变就是一部个体心理与集体心态互为镶嵌的精神蜕变史。

关键词 变迁时代, 心理史与心态史, 生命历程, 人生转折, 心理嬗变

分类号 B849: C91

最近 40 年来, 拜 1978 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之赐, 中国社会发生了朝向现代化的巨大变迁或曰朝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型。有鉴于变迁或转型与社会科学的天然关联, 这场大变革在时间上不断绵延、空间上不断扩展的态势, 引发了社会科学家们的关注。不仅研究的内容和领域涉及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李培林, 1992; Cai et al., 2018)、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陆学艺, 2010)、社会转型与市场发展的路径、家庭结构和规模的嬗变等领域, 而且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转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变迁, 有其凸显的稳健性和连续性(Tucker, 2010: 177), 并因其内部的运作机制和演变逻辑的独特性, 以及对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变革的兼容并蓄, 而带有文明转折的意蕴(孙立平, 2005), 能够与波兰尼的“大转型”以及布洛维的“第二次大转型”(Burawoy, 2000)相媲美。

在转型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影响之

外, 大变迁对个体与群体或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重塑, 同样受到了以心理学家及社会心理学家为主的社会科学家们的关注(蔡华俭 等, 2020)。黄梓航等人从心理学角度考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变迁导致的民众心理变化, 发现在集体主义式微的同时, 个体主义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黄梓航 等, 2018); 同时, 该课题组还从多方面梳理了社会学界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心理变化影响的研究(黄梓航 等, 2021)。在此之前, 不仅方文提出, 以群体资格为核心的转型心理学可为直面中国经验的社会心理学提供洞识和灵感(方文, 2008), 而且诸多研究直接关涉到因社会转型而引发的个体或群体社会心理嬗变的多种面向(周晓虹, 1998; 许琪 等, 2020; 胡洁, 2020a, 2020b); 与“中国经验”相对应, 周晓虹提出了表征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中国体验”, 用以描述社会转型带来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周晓虹 等, 2017)。从某种

收稿日期: 2022-10-01

* 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2022300006)资助。

通信作者: 周晓虹, E-mail: xhzhou@nju.edu.cn

程度上说, 本研究是上述视角的一种延续, 同样涉及转型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 不过关注的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1979年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的第一代社会学家。

1 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此后40余年里, 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纵观40余年的变化, 尤其是1992年后朝向市场的改革不仅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和民生的改善奠定了基础, 也必然导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发生了朝向现代的明显嬗变。

前述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多项研究已经证实, 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的转变几乎贯穿当代中国人的生命全程, 成为社会转型这把“雕刻刀”在投身或参与其间的每个行动者身上留下的独特印记(方文, 2008)。在过往的研究中, 社会心理学家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通过《大萧条的孩子们》(Elder, 1999), 开辟了将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与个体的生命历程及精神嬗变相关联的研究传统(George, 1993; Mayer, 2009; Eliason et al., 2015), 并因“为社会心理学或更广泛地说为研究社会生活的学术共同体开辟了一条道路或一种‘生命历程’(life course)”, 而荣膺1993年库利-米德奖(Corsaro, 1994)。此后, 周雪光和侯立仁接续这一传统, 讨论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1960~1970年间国家政策、生命周期和社会分层过程之间的关联。如果说埃尔德的研究说明了包括重大危机和转折在内的宏观社会变迁如何赋予了全体人民共有的集体经历, 并影响或重塑了个体的生命历程和集体的社会心态; 那么, 周雪光和侯立仁的研究, 则交代了知青们的“上山下乡经历对个人生命历程具有(何种)持续不辍的影响”(Zhou & Hou, 1999)。

1.1 口述史与集体记忆: 心理史与心态史的互嵌

作为构成人类共同体的精神传统之一, 集体记忆及通常用来表征集体记忆的个体的口述历史, 并非单纯的个人经验的简单累加, 而是某种经由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的“社会建构”(Halbwachs, 1992)过程形成的突生现象。这多少预示着, 通过“口述”(oral)和“历史”(history)这两个概念并置所形成的“口述史”研究方法, 既奠基于个体生命史及相应的精神或心理蜕变, 但同时又不能不触及由这些个体在具体的时空交错中形成的群体、共同体或命运共

同体(communities of fate)的共同经历或集体心态。对应于这样一种表述, 我们可以在侧重个体经验尤其是早期经验对个体心理蜕变之影响的心理史学和关注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与集体心理的心态史学这样两个向度上, 以下述知青一代社会学家及他们所形成的特定的命运共同体为例, 探讨变迁时代的精神嬗变。

作为学科的口述史, 被认为始于阿兰·内文斯(Allen Nevins)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的口述历史研究室, 但它在当代的流行, 则一方面归因于由英国社会史学和法国年鉴史学派倡导的历史学转向——这一转向提倡“自下而上看历史”, 对劳动者或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怀有浓厚的兴趣; 另一方面也归因于现代数字技术的进步和便捷。就前一个原因而言, 如保尔·汤普森(Paul Thompson)所言: “口述史意味着多种历史的重心转移”(Thompson, 2000: 7); 而就后一个原因而言, 不仅最初的口述史学的流行有赖于20世纪音影设备和技术的进步, 而且归因于“新的数字技术(也)正在改变我们记录、解释、分享和呈现口述历史的方式”, 由此引发了口述史学领域全新的范式革命(Thompson, 2017)。

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和心态史学(history of mentalities)是20世纪初欧美史学界先后出现的两种学术流派或分析范式, 这些冠以“新史学”的尝试都欲图借鉴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解释人类参与或投身历史事件的动机及相应的心理后果。两者的区别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和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两部同名著作的差异中可见一斑: 前者的《青年路德: 一种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和后者的《马丁·路德: 一个命运》尽管都是以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为题写成, 但《青年路德》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着重的是路德的个人经历尤其是童年及青年早期的经验对其后来的性格及政治活动的影响; 而后者的《马丁·路德: 一个命运》则明显秉承了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早期法国社会学传统, 费弗尔敏锐地意识到路德的反叛是由那个时代市民阶级的整体精神氛围酿就的, 因为他们在那个历史时期“获得(了)‘新的社会重要感’, 对教士在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位置心怀不满”(伯克, 2016: 31)。

心理史学开端于弗洛伊德1910年出版的《达·芬奇及其童年的回忆》, 它使得后来以杰出人物为叙事中心的心理传记学成为心理史学的主要

形态。1930年代后,随着L.皮尔斯·克拉克(L. Pierce Clark)创用的“心理史”和“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两词的流行(Elovitz, 2018),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成的对历史强人的精神世界及形成过程的探寻,出现了诸多后来受到批评的主要借用精神分析方法对历史人物及其动机进行解释的尝试。与心理史学相比,略晚一些由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创设的心态史学受到的推崇要小于其受到的挑战。这一学派的形成与1929年创立的《经济社会年鉴》有关,尤其是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及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vre)等曾任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学家通过“相互交流,对历史的主题和目标有了一些大致的假设”(Forster, 1978)。受涂尔干及法国社会学的影响,他们从社会史入手触及不同时代的集体氛围,终使“心态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带有明显的年鉴史学的印记”(Hutton, 1981)。

当然,尽管源自两种不同的传统,我们只要不夸大两者的对立,尤其将个体的生命史置于群体或命运共同体共享的历史及经验中来解释,就能够发现:一方面单个个体的心理蜕变有赖于他们生存其间的群体氛围;另一方面也正是依靠单个个体的心理蜕变及由互动产生的突生性,才最终酿就了群体及社会不断变动的整体心理态势或精神氛围。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将要叙述的知青社会学家的心理嬗变就是一部个体心理与集体心态互为镶嵌的精神蜕变史。

1.2 研究对象及选择意义

在完成了理论背景的交代和口述史方法之后,我们有必要说明本文所依据的经验资料的主要来源。有意思的是,我们通过口述史采集的个人生命史的叙述,包括了前述秉承埃尔德生命历程研究传统并在中国视域内做出贡献的周雪光在内的40位社会学家。2019年恰逢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开启了这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其中包括5位直接参与重建的“海外”及“境外”学者,他们在台港地区长大,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除林南留任美国外,金耀基、李沛良、叶启政和杨中芳则先后任教于台港高校;边燕杰、谢宇、赵鼎新、周敏和周雪光5位学者在大陆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后任教于美国的大学,但自20世纪90年代起持续回国参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除了成长于台港地区的金耀基等5位学者,及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驼、30年代的沙莲香和40年

代的苏国勋(他们都在“文革”前完成了大学教育)外,边燕杰等5位海外华人学者和李培林等27位本土学者都在“文革”前后开始接受中小学教育,在动荡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因此有着十分近似的生命历程和个人体验。他们在完成不算正规的中学教育后,除6位相对年轻的未及下乡便遇上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其余绝大多数人在上大学前便已走上社会:19位是插队或回乡知青,¹其余7人做工、当兵或任中小学教师。考虑到“上山下乡”一度曾是改革开放之前年轻一代的主要职业选择,我们可以将这一代社会学人统称为“知青社会学家”,其共同特点有二:(1)因“文革”爆发耽误了继续受教育的时机,他们大多是在“文革”结束后考入大学的,此时离高中或初中毕业最长的已有10年之久;(2)因为上述独特的个人生命史,他们一般都对农村或工厂、兵营等基层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了解。

进一步说,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个人生命史及心路历程为例,研究转型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从心理学或整个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具有这样一些鲜明的学术意义:(1)作为现代性的后果之一,或者作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产物,恐怕没有哪个学科比社会学更加关注变迁或转型对理解人类社会及其行为的意义,社会学家也因此最能体悟变迁的后果,或变迁对社会结构与个体心灵的建构或重构作用。(2)从中国社会学来看,有鉴于旧中国的社会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废黜,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第一代学人即使未驾鹤西去,大多也已进入身心俱衰的耄耋之年,因此知青社会学人是重建后的第一代社会学人。他们后来的个人生命史既与改革开放同步,也与社会学科最初的重建历史同构,因此本身就是表征社会变迁或转型时代心理蜕变的合适案例。(3)尤为重要的是,如果你意识到我们在这里谈论社会变迁和个体蜕变主题所依据的这些社会学家,40年前大多曾是农民、工人和士兵时,就不由得会想起埃尔德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中写下的那句名言:“当我们对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感到惊诧时,就能看到变革时代留在我们生命中的烙印构成了绵延不绝的魅力之源”(Elder, 1999: 301)。确实,分析在短短40年中这一代社会学人个体生涯和心理世界的巨大转变,是说

¹ “插队知青”指高中或初中毕业后从城市到农村、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的知青,“回乡知青”则指家在农村、高中或初中毕业后返乡务农的知青。

明我们这个时代翻天覆地变化的最佳路径之一。

2 “知青”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事件、经历与“神话”

与本文相关的重要概念——生命历程(life course)及相应的理论,导源于早先对发展心理学中有关从生到死的所谓“生命跨度”(life span)研究十分熟捻的格伦·埃尔德。在埃尔德之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同时出生在世的一代人,因为“经历了同一具体历史问题”而具有“意识的高度相似性”(Mannheim, 1952: 304)。受曼海姆的影响,诺曼·雷德尔(Norman Ryder)提出了“同期群”(cohort)概念来指代“在同一历史时段经历了同一事件影响的一群人”(Ryder, 1965)。更早一些,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lorian W. Znaniecki)在后来成为芝加哥学派标志性成果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1918~1920)一书中,将生活史和生命轨迹的概念引入了波兰移民研究的叙事之中,这一切都成为埃尔德开创的生命历程研究的学术渊薮。

2.1 生命历程及与其相关的分析概念

埃尔德认为“生命历程代表了我们如何思考和研究人类生活的一种主要变化”(Elder, 1994),可以界定为“一种由社会定义的并按年龄分级的事件和角色模式,它受制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Elder, 1999: 302)。与此相关的主要原则有四:(1)个体的生命历程镶嵌在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由其所塑造;(2)一系列的生活转变或各类事件的影响,取决于它们何时发生在一个人的生活之中;(3)生命存在于彼此间的相互依赖之中,而社会-历史的影响通过这一共享的关系网络得以体现;最后,(4)个体能够在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下,通过选择和行动,建构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Elder, 1999: 304-308)。

当代中国的诸多历史事件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急速变迁对每个人的生命史与人生轨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使得引入生命历程理论作为解释框架在中国具有某种契合性。这种契合性尤其体现在两个重要的分析性概念上:(1)轨迹(trajjectory),即个人在生命历程或整个生命跨度中的成长轨迹,由毕业、工作、结婚等一系列的事件或因此获得的各种角色构成了前后相继的发展轨迹;(2)转变(transition),即由某些重要的生活事件所造成的人生转折,如知青社会学家在“文革”中下乡、做工、

当兵,“文革”结束后的几年(1977~1980)参加“高考”,紧接着参加1979年社会学重建后开办的各类讲习班或南开大学举办的专业班,从而锚定了自己一生的职业生涯。尤为重要的是,在延续的轨迹和断裂的转变的相互作用下,就会产生整体生命历程中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它改变了生命历程的方向,也因此会对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或行为模式产生持续不辍的影响。

转变的重要性体现在我们的口述史访谈中,表现为不止一位学者对“上山下乡”或“高考”等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予以了过度 and 反复的强调:在内蒙古插队、后来留学美国获得布朗大学博士学位的马戎说,“这些经历对我之后的人生也有很大影响”(马戎口述, 504);而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10年的李强则强调,“高考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特别重要”(李强口述, 370)。²就知青一代社会学家及其心路历程而言,通过他们的口头叙述所彰显出的个人生命史,你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一生如何镶嵌到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轨迹之中。伴随着宏观的社会变迁,他们各自拥有又相互共有的人生体验促成了丰富多彩的心理蜕变,也最终通过互动、认同与共情(empathy)成为一个时代相似的精神气质与共有心态。

2.2 事件、经历与“神话”:知青社会学家的历史三调

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历史从改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角度说不可谓不宏大,而从改革所遭遇的困难尤其是观念的冲突来说又不可谓不惊心动魄。对这场席卷整个中国的大变迁来说,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显然具有分水岭般的划时代作用。不过,这段历史并非只是由一系列政治史实或不断增长的GDP数据构成的,用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柯文(Paul Cohen)的说法,历史的叙事,尤其是对它的大多数经历者依旧健在的历史的叙事,起码包括事件(event)、经历(experience)和神话(myth)三种方式,它们都是“人们了解过往的意义、接近并最终认识历史真相的不同路径”(Cohen, 1997: 289)。

如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讨论知青社会学人的生命历程,所谓事件,即在他们投身社会学重建

² 本文所引述的亲历者口述资料均来自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上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因本书上下两卷页码联排的缘故,为方便及简洁起见,本文引文仅标明口述的亲历者姓名及引文所在页码。

之前尤其是之后 40 年中发生的一系列有据可考的“故事”，尤其是“上山下乡”“高考”“社会学重建”“南开班”等在他们的个人生命史中起到改变人生方向的若干转折性事件。有关这类历史事件及其意义的解释通常只是历史学家乃至国家叙事的连带部分，在官方的叙事中，包括“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关系”以及实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政策……1978 年后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共中央，202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消多年的高考重新开启，废黜近 30 年的社会学也开始在邓小平的“补课”号召、胡乔木的敦促、费孝通与杨庆堃等人的操办下获得重生（费孝通，2000）。

同事件相比，经历则凸显出相当的主观性，在这里既是历史的直接参与者知青社会学家在变迁时代的思虑、体验和行为，也在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他们在人生的转折关头所经历的各种心理嬗变。知青社会学人的经历显然是以他们被卷入历史事件时的感觉为基础的，其间也间杂着复杂的情感体验，1968 年刘少杰下乡时知青点有人做饭，“隔一段时间召开一个‘地富反坏右’批斗会，……唱着革命歌曲做农活，我们自己也有优越感”，但没过多久就明白了自己“是接受教育者，而贫下中农是教育者”（刘少杰口述，445）。同下乡或做工时心理的跌落相比，1978 年后他们开始弹奏的曲目是“步步高”：插队 10 年、快 30 岁时上大学的张乐天还记得：“当时戴着复旦校徽出去，人家都会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你”（张乐天口述，876）；而上过“南开班”并在费孝通推荐下去法国留学的李友梅，归国后也很快“成为全国第一位由校长直接聘任的教授”（李友梅口述，401）。

最后，所谓神话，自然会带有某种不真实或夸大，但当代的神话常常是在人们普遍的社会心态基础上对多少有迹可循的故事或现象所做的想象加工或情感修饰。比如，近几十年来，有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因此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的知青一代成功的神话，自然有“为现实的政治或宣传目的服务”（Cohen，1997：64）的动机，但却不能否认在 1700 万知青中，当时及后来都确实涌现出过大量的优秀分子，以致人们公认“知青已经通过各种重要的方式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做出了贡献”（Zhou & Hou，1999）。进一步，有关知青社会学家及某个机构（如南开班）的建构性神话和近来出现的解构性

尝试，同样是一部社会学史及集体心态史必不可少的范式形成与危机的常规叙事。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是将知青及其优秀群体比如七七、七八级的“神话”，尤其是本文述及的知青社会学人或“南开班”的学科“神话”及其建构（南开大学社会学系，2019；张龙，2021），置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整体性社会氛围或集体心态中去理解。从那以后，七七、七八级成了叙述中国高等教育史必备的神龛；而最先投身社会学重建的一代学人也自然具备了某种令人炫目的光环。

3 变革时代知青社会学家的个体心理蜕变

1979 年社会学重建时最初投身这一学科的“知青社会学家”，尽管年龄相差较大，不一定属于同一世代，但因为大都经历过“文革”及“上山下乡”、“高考”等历史事件，依旧属于一个“同期群”（cohort）。他们因为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及社会变迁全程，因而人生转折急速，社会阅历丰富，他们的个人生命史镶嵌在宏大的社会转型之中，由此经历了一场与社会变迁同向而行的个体心理或精神蜕变。这场蜕变重构了他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的情感世界，也增强了他们个人行为倾向的现代性。

3.1 转型或变迁重构了知青社会学家的认知结构

认知方式或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是人们在接触周遭世界或社会环境时汲取、组织和加工信息并做出解释与判断时相对恒定的模式。自 1954 年美国心理学家赫尔曼·威特金（Herman A. Witkin）的“棒框实验”后（Witkin，1967），场域独立-场域依赖成为两种最为常见的认知风格，而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堪称汗牛充栋。后来的一系列研究将这两种认知风格与东西方两种文化模式相关联（Glebkina，2015），并衍生出以此为基准的各种亚型。理查德·奈斯比特（Richard E. Nisbett）等人甚至将这两种认知方式的差异上溯至数千年前的东西方传统，认为“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所特有的社会心理差异确实存在。中国和其他东亚社会仍然是集体主义的，以群体为导向；与此相反，美国和其他受欧洲影响的社会是个体主义的”（Nisbett et al.，2001）。

我们否认东西方的历史与传统可能会使人们在认知世界的方式上存在差异，但是，人们生存其间的社会环境及其当代变迁，更在相当程度上塑造或改变着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或认知结构。从社

会学家的个人生命史及具体叙事来看, 尽管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迄今不过40余年, 但发生在其间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及整体的迅疾变迁却像蔡禾所言, 作为“社会变迁的亲历者, 亲历本身当然会影响到对时代的理解和问题的认识”(蔡禾口述, 218)。如果从认知方式的差异角度, 我们可以将知青社会学家的重构或转变模式大致概括为: 从一元到多元、从依赖到独立、从非此即彼到兼容并蓄、从耽于表面到追根溯源……

在我们的口述访谈中, 能够体现上述转变或重构的叙事比比皆是。有鉴于大多数“知青”在上山下乡前都生活在物质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 改革开放前的“正统”教育及理论灌输又基本回避了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与矛盾, 这使他们在真正接触社会后都会发生惊诧甚至不适。关信平谈到, 如果说高中阶段去农村的社会调查就让他看到, “实际情况与我们所接受的宣传教育存在矛盾之处, 那么在我进入农村、与许多农民有直接接触之后, 就更容易发现当时的理论很难解释现实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难以解释的问题有很多, 最常见的包括农民会问: “工人生产一个小手表, 值100多块钱, 我们生产那么一大堆粮食为什么还不值他一个手表的钱?” 在当时给定的解释中, 生产手表是复杂劳动, 生产粮食是简单劳动, 而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但是, 后来尤其是以社会学为职业后关信平才知道, “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比如国家的统一定价造成工农产品剪刀差”(关信平口述, 224-225)。

抱着这样的疑问, 这一代学人在下乡或做工时有许多都有苦读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倡的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6本马列原著的经历(沈原口述, 629), 尽管在那里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但却意外培养了他们后来从事社会学研究必要的理论思维能力; 加之沉浸下去, “在村子里有了农民知心朋友之后, 就日渐加深了对农村发展史的了解”, 及至1978年邓小平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 他们比其他人能够更早地“断定农村改革一定会成功, 因为我(们)的农村经历表明, 土地使用权的个体化是农民所迷恋的制度(边燕杰口述, 990-991)。

上述认知方式的转变, 使他们既不迷信书本或教条, 也并不盲从任何学术权威。随父母下放乡下、后来在纺织厂当过7年工人的蔡禾提到, 1995年他读到了美国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 为“如此精致的田野资料收集”和理论创新所震撼。但“随着阅读的深入,

我越来越感觉他的一些理论和结论与我的工厂体验有所不同, 也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比如, 蔡禾对魏昂德提出的解释中国工厂权威形成的权力-依附关系理论提出了质疑: 在中国工厂制度中有两种资源: 身份性资源是你有企业职工的身份就能占有的相关报酬和福利, 是无法产生依附关系的; 行为性资源即因表现好坏才能获得奖励、入党和提干等资源, 确实可以产生依附关系, 但在奖金微乎其微、入党也难于上青天的年代, “大多数工人并没把这些东西看得那么重, (因此)领导者是难以借助这些资源控制来获取大多数工人的依附的”(蔡禾口述, 213-214)。

3.2 转型或变迁改变了知青社会学家的情感世界

有关人类情感及情绪的研究一直是心理学的传统领域, 在情感研究中最主要的分歧一直存在于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 一些学者认为情感是与生俱来的, 而另一些则认为它是一种“社会建构”。换言之, 除却部分生物学因素, “个体的所思、所虑及所感大部分是社会组织的行为和话语模式的产物”(Rosaldo, 1984: 147)。

回到我们讨论的知青社会学家。因为青年时代正逢“文革”, 当时的他们多怀“解放全人类”之大志, 尽管有些人因家庭出身或父母被打倒而受到连累(李培林口述, 330; 李强口述, 363), 但大多数人对投身包括参加“造反”在内的各类政治运动总体上说都十分积极(雷洪口述, 276; 谢寿光口述, 791; 张乐天口述, 871), 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更是许多人自己的主动选择(关信平口述, 226; 周晓虹口述, 932)。不过, 最早就是在农村, 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连带情感世界遭受了现实的严峻冲击: 关信平发现, 农民对人民公社及集体劳动缺乏感情, 所以“他们(既)教我们怎么干活, 但很多时候也教我们怎么去偷懒”(关信平口述, 226); 周晓虹则对春节也不准“地富反坏”放假休息的做法产生了疑问, 从此原先牢固的“阶级情感”发生了动摇(周晓虹口述, 933)。

在传统的情感尺度发生动摇的同时, 改革开放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地富“摘帽”及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政策, 使他们的情感世界或爱憎标准发生了重构。一方面, “以阶级斗争为纲”政策的退场, 改变了知青社会学家非此即彼的爱憎或情感维度; 另一方面, 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 以及他们因职业而生的“志在富民”的学科情怀, 经费孝通先生的不断提倡, 终成主导他们后来情感世界的主干结

构。在我们的口述访谈中,知青社会学人不断强调“学术追求和富民情怀(又)是毕生志趣”(李培林口述,355)。确实,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中,他们都将自己的目光投向普通的工人、农民、农民工、流动人口、家政工以及一般的弱势群体,以个人之努力实践了费孝通先生当年放弃医学转入社会学时的信念:“‘为万民造福’比‘为个人治病’更有意义”(费孝通,1999,第12卷:43)。

3.3 转型或变迁增强了知青社会学家的个人现代性

社会学是因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而生的,或者说像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Giddens, 1982: 46)。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冷战”氛围的加持下(Peck, 1969),现代化及人的现代性研究蓬勃发展(Inkeles, 1975; Kahl, 1968)。1979年社会学重建后曾多次来南开大学授课的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就提出,伴随现代社会的变迁,人的心理也会出现明显的蜕变:除了如前所述具备现代认知和情感外,现代人在行为趋向向上应是积极参与的公民、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乐于接受新挑战和新观念,而促成这种蜕变的因素包括教育、工厂体验、都市生活及大众媒介(英克尔斯,史密斯,1992)。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在40余年来的职业生涯中,知青社会学人的个人现代性不断增强:(1)他们逐步具备了鲜明的变革意识,意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变革,而改革开放就是广泛而意义深远的一场大变革,所以“中国社会学要推动社会变化”(李培林口述,348)。(2)他们也意识到,做研究要思想敏锐,要敢为天下先。因为在这个时代,不要说“你饱读诗书,你自己就是图书馆都不行,你得有新思想,新思想从何而来?敏锐性!...就是要有对问题的敏锐”(李路路口述,326-327)。(3)再进一步,你还能够发现,知青社会学人大都对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各种新事物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邱泽奇说过,1980年左右,上大学时学校请了一位美国老师讲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技术及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有一段讲复印机的工作原理,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当时的兴趣对我后来的科学取向产生了蛮大的影响”(邱泽奇口述,565)。作为这一影响的后果,他不仅与人在美国的谢宇教授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而且十多年来一直关注数字社会;近年来,更是通过对“淘宝村”的研究,对电商技术在农村的应用及对共同富裕的促进做

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邱泽奇,乔天宇,2021)。

4 叙事表征与知青社会学家的集体心态转型

转型时代对个人心理的塑造只是我们讨论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与宏观社会的变动更具嵌入关系的,当属在转型背景下形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某些社会群体中的宏观、变动和突生的社会心理态势”(周晓虹,2014)。其实,无论是前述个体的心理蜕变,还是我们将要论述的集体的精神嬗变,往往互为交织,并由前者的叠加而生成后者独具的突生(emergent)性质。就像我们已经交待的那样,它使得一个社会或某一群体的心理嬗变常常就是一部个体心理与集体心态互为镶嵌的精神蜕变史。如此,我们可以认为,“个人经验,即使具有最私人的、个人的和亲密的性质,也是正在进行的动态社会进程的结果;它们被铭记于一个特定的物理和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存储在记忆里,并通过与其他重要他人或重要群体的连续互换重新得以收集”(Apfelbaum, 2010)。沿着这样的路径,我们能够发现,在40年的历史变迁中,正是在构成知青社会学家话语叙事的主流基调中,表征或呈现出了社会学家这个独特群体在大变革时代鲜明的集体心态。

4.1 集体叙事主题之一:中国式现代化与富民实践

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此前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尤其是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及同年由小岗村的变革引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稍后开启的企业经济责任制,造就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向现代化进军”的万千气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第二次解放的喜悦下,根据邓小平提出的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94: 181)的指示,被废黜近30年的社会学得以恢复。

社会学重建与改革开放同轨并行的历史,使得这一学科再生伊始,就踏上了万象更新的现代化征程,也使得20世纪初在中国萌生之时便提倡“经世济民”的社会学再度对接进了服务国家的行列。作为重建的主帅,费孝通在1980年夏举办的第一届讲习班开课时,就向以知青一代为主体的学员们申明:要建设“以认识中国社会为宗旨的‘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苏国勋口述,601);并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一直将“志在富民”作为服务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围绕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重建不久的社会学很快找到了自己最初的叙事主题,从中也透露出一代社会学人投身这一变革的集体心态。从费孝通两位弟子的口述史中,就鲜明地流露出他们以社会学为志业的择业动机。1980年先考入内蒙师大化学系,后转入日语系的包智明,是蒙古黄金家族孛儿只斤氏的后裔,因此研究生攻读的专业是属于蒙古语族的保安语,但在青海和甘肃做调查时,却从已经多少汉化的保安族百姓的不甚积极的反应中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疑虑。疑虑尤其是对现实的关切,促成了包智明的人生转向。学了社会学后,“阅读费老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农村研究和80年代的小城镇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我感受到了费老身上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和‘志在富民’的学术价值观”(包智明口述,170-171)。

无独有偶。16岁考入农学院植保专业的邱泽奇,因攻读农业史研究生接触到第一代社会学家杨开道的资料,并进而了解了费孝通及农村社会学。此后,尤其是考入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后,农村尤其是乡镇企业研究成了他后来孜孜不倦的研究主题。受导师的影响,邱泽奇一直“关注的是中国的发展问题,是贫困地区的人吃饱饭,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袋里有钱,三线国有企业孤岛上的年轻人有工作”(邱泽奇口述,576)。这种欲图像自己的老师一样树“经世济民”之志,投身现代化大业的动机,后来甚至引发了他对西方中国研究模式的质疑。

对现代化的热切向往,所以会在80年代成为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共同持有的社会心态,既形成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带给我们民族的屈辱历史,也归咎于十年“文革”导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几近奔溃。如果说先前的屈辱使费孝通和金耀基等前两代学人不断向后辈学人复述“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费孝通,1999,第7卷:457),并深信“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为何促进、完成中国的现代化”(金耀基口述,24);那么刚刚结束的那场“浩劫”则使知青社会学人在生命历程骤然翻转的同时,因改革开放而感受到了整个社会“洋溢着激奋的年代才有的特殊气息”(周晓虹口述,936),并因此“处在一种‘躁动’的状态”(李路路口述,308)。在这种躁动之下,这群甫一投身社会学的年轻学子,像他们的老师一样开始急切地“想着改造社会”(周雪光口述,1118)。

4.2 集体叙事主题之二:遂生乐业的心态秩序

如果说“每一代人都受制于命运的摆布,都与他人生命历程中的林林总总的事件相关联”(Elder, 1999: 330),那么在知青社会学家成长的年代,能够“摆布”或左右他们集体命运的堪称重大的历史事件绝非只有一个“文革”或“上山下乡”,即使是绵延40余年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单个事件,它包含了一系列后来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崛起和走向的历史性事件。

在这些事件中,最使包括社会学人在内的那时还颇为清贫的青年知识分子焦躁的,当属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掀起的“下海潮”。在当时,朝向市场化的变革,在促进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日常的内生性焦虑。一时间无数人奔向南方创业,“让我们这些还呆在‘岸’上的人在羡慕之余,确实第一次产生了深深的‘认同’危机。……‘留下,还是出走’,这确实成了一个问题!”(周晓虹口述,939)

几乎在包括社会学人在内的青年知识分子流露出彷徨的同时,堪称“智者”的费孝通最先意识到了这场伟大的变革将要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但也会对原有的社会秩序带来猛烈的冲击,甚至带来“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为此,费孝通借用了业师潘光旦生前反复阐发的“安其所,遂其生”的“位育论”:提倡在迅猛变革的时代能够“建立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费孝通,1999,第12卷:316,315)。

尽管和其他学科一样,也有无数社会学学子顺应时势,投身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以致在广东等地“没有几个人留在高校工作,当时从政的也多数下海了”(蔡禾口述,207);但费孝通的感言却在无形中鼓励了一批年轻学人留下来继续从事研究,他们在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甘守清贫、没有动过离开自己心仪学科的念头。不过,受自己学科性质的影响,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后来的生命历程和学术实践。一系列在40余年的改革开放时代先后涌现的现象和问题,都引起过或现在依旧受到这一代学人的关注。正是因为意识到“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大转型,的确为社会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他们大多认同“这个职业还是不错的”(周敏口述,1102,1099),并深信“社会学是一门值得你爱的学科”(周怡口述,954)。

4.3 集体叙事主题之三：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

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是一个绵延近百年的议题，也是窥见中国三代社会学者欲图摆脱学术依附、谋求主体性的集体心态的最佳窗口。20 世纪 30 年代，当留学欧美的第一代社会学者返回中国后，在“读了许多西方书本，(却)对中国情况依然惘然无知”，“不免焦虑不安”（费孝通，1999，第 13 卷：7）的背景下，孙本文和吴文藻以各自的方式在南北中国上演了一场社会学中国化的“双推磨”（周晓虹，2017）。1949 年后，虽然社会学在大陆被废黜，但在台湾地区勉为其难的接续过程中，30 年代的大陆情形再度重演：尤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自欧美留学的社会科学家批量归台后，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在海峡对岸拉开了帷幕。此次我们访谈的几位曾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海外兵团”或“境外兵团”，当年都现身过这场学术运动，其中金耀基、林南和叶启政还是旗帜性人物。

在中国社会学最初的重建中，上述两代学人的中国化或本土化观点，连带他们的民族情感与学术自尊，被有效地传递到知青社会学者，在后者成长为中国社会学的中坚之后日渐成为一种主流心态。如果说这种心态的形成最初与前两代学人的薪火相传有关，那么后来则是他们通过将早年的底层体验与后来的学术实践融会贯通获得的心得：留学美国、获得生物学和社会学两个博士学位的赵鼎新说，长期的自然科学训练，加上“苦难人生磨练，读过大量的‘杂书’”，使得“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一套东西很难套住我”（赵鼎新口述，1067）；李强也说，投身社会学“几十年以后，越研究中国越感到西方的理论难以充分理解中国社会”（李强口述，384）。进一步，这种在阅读和实践中感悟到的差异，近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及道路特殊性的彰显，逐渐“有了自信，开始重视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李培林口述，353），感到“中国社会学要有自己的理论”（胡荣口述，269），也希望“得到贴切反映中国社会实际的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的支持”，以“文化自觉”意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设”（李友梅口述，412）。

不过，时代的进步在于，知青社会学者对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理解并不狭隘，有时甚至显露出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抵牾。所以，张静一方面认为“中国经验能为全世界提供新知识”，另一方面又申明“如果本土化的意思是将本土议题和一般知识体系

联系起来，我是支持的；但如果本土化的意思是拒绝一般知识，着力生产一种只属于本土的知识，我怀疑这样做的价值”（张静口述，864）；刘世定也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特殊的、只属于中国的社会学”（刘世定口述，494）。正由此，尽管在谢宇、翟学伟和周晓虹之间展开过一场有关本土化的争论（参见周晓虹，2020），但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拒绝与西方知识体系的交流，也没有人反对如何通过本土知识的凝练，像费孝通所言，“把我们文化中的好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费孝通，2013：54）。如果说有差异的话，那么它只存在于如何将本土的实践转化为能够与西方乃至世界交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

5 讨论与结语：个体心理与集体心态的交织与嬗变

行文至此，我们大致描述并深入分析了 40 位社会学者尤其是其中的知青社会学者在过往 40 年中的心理嬗变。基于在过往的历时态尝试中，曾形成了心理史学和心态史学两种立意迥异的分析范式或研究路径，我们也试图沿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面向呈现知青社会学者相对完整的精神嬗变过程。不过，虽然我们了解两种传统的差异，却力图在两者之间找到某种重叠或共通的部分，以便能够将个体的生命史置于群体或命运共同体共享的历史及经验中来解释，同时获得某种对话的可能。为此，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除了做出简短的总结外，我们将着重围绕个体与群体（社会）的关系问题，讨论变迁时代个体的心理蜕变与群体（社会）的心态建构，以求再次说明我们一再力图说明的观点：在改革开放的 40 年里，知青社会学家的心理嬗变就是一部个体心理与集体心态互为镶嵌的精神蜕变史。

5.1 个体心理与集体心态：蜕变与建构

在讨论个体心理和集体心态的蜕变与建构关系时，首先有必要对这两种精神现象的变化单独加以说明，以便在厘清各自的内涵和边界的前提下，再行讨论两者间的彼此镶嵌或相互建构过程。就个体心理而言，无论站在心理学史还是心态史学的立场，人们都不否认单个个体的变化或建构有赖于他们生存其间的群体氛围或社会环境。就前述生命历程理论的四大基本原则而言：第一，既然每个个体的生命历程都不能不嵌入历史的时间（timing）和他们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包括心理或精神世界在内的一切就不能不受到这些事件的塑造，并因这种塑造

而在时间向度上表现为某种前后相继的蜕变或建构。在心理史学的研究中,埃里克森对青年路德的认同变化的解释并没有脱离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只是他将个人的认同危机的解决简单地部分等同于那个时代社会问题的解决;同理,彼得·洛温伯格对纳粹青年的研究(Loewenberg, 1971),也没有脱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场大萧条,问题只是在将希特勒解释为能够弥补大萧条中青年一代创伤的父爱来源,则抽离了历史背景中的社会意义。第二,生命事件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取决于它什么时间发生在个人的生活中。强调童年期经验的心理意义是弗洛伊德的标配,埃里克森则将事件的意义平铺在生命全程之中,尽管不同阶段意义并不相同。在我们的研究中,因为知青社会学家的生命跨度都长达60年以上,你既能清晰地发现早年生活尤其是插队或做工时的底层体验对他们后来的影响,也能看到他们个体心理的蜕变及建构一直呼应着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生命个体的心理蜕变都是延续的,是变革时代必然的精神后果之一。

生命历程理论的后两条原则,用于集体社会心态的蜕变或建构解释更为贴切。第三,基于个体生命相互间的依赖,社会历史影响可以通过这一共享的关系网络得以实现。在年鉴学派走红的年代,学者们都力求烘托由民众共享的关系网络来说明集体心态的形成与流变。在我们有关知青社会学家的说明中,20世纪80年代他们对现代化的执著追求和无悔热情,就不仅与当时的民众对现代化的集体向往有关,也与前辈学人通过学缘关系所做的传承有关。第四,历史与社会环境对个人与群体有着这样那样的制约,但人们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体,也能够通过选择和行动,建构自己的生命历程,并因此改变社会心态。具体到知青社会学人,不仅他们的一生充分表征了自我选择的意义,而且也体现了他们是作为“主体”而获得反思意识的集体或命运共同体。

5.2 个体心理与集体心态的互构: 互动、认同与共情

既然个体心理与集体心态互为镶嵌共生,在这里我们需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由一个个单个个体的心理及其蜕变,是如何互构(inter-construction)整合成某一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集体心态或精神氛围的?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4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引发的急速的宏观社会变迁,知青

社会学家各自经历又相互共有的人生体验促成了他们丰富多彩的心理嬗变;进一步,通过互动、认同与共情(empathy)成为一个群体与时代相吻合的相似的精神气质与普遍心态。

第一步,互动(interaction)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行为,无论是群体还是社会,它的形成都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为前提的。正是因为互动,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联结在一起,形成某个地域或职业共同体,再或在某种不可逃避又持续较长时间的情况下形成某个命运共同体。以知青社会学人为例,从1980年第一届社会学讲习班开始,一直到今天越来越频繁的学术会议和日常交流,他们在互动中不断地谈论自己的经历,并对这些在相当程度上共有的经历及其意义做出解释。这种谈论和解释为单个个体的心理蜕变叠加或交织成知青社会学家共同体的社会共识或普遍心态提供了外在的可能。

第二步,上述外在的交流或互动会转变成对个人身份、个人与他人关系的认知性探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认同”或“社会认同”的形成过程。其实,认同不仅是心理史学赖以维系的一个学术概念,也是个体心理向群体心态转变的一个关键。能够促成共同体成员社会认同的路径有许多,社会学重建40年里,几乎每隔十年一次的以历史叙事为主要方式的纪念活动,已被证明是强化知青社会学人相互认同的最佳方式。此时,围绕当年的重建及自身的经历,人们都会一遍遍重复讲习班、南开专业(修)班、费孝通与彼得·布劳(Peter M. Blau)³及林南的故事,显然“讲故事是支持记忆、保持过去、激活以往体验乃至构建集体认同的一个根本要素”(韦尔策, 2007: 93)。

最后,或者说第三步,在互动和认同之后,从行动和认知层面会进一步深入到情感层面的相互分有,即我们所说的“共情”。这个被德国美学家们最先使用的德语词汇 Einfühlung (一译“移情”),20世纪上半叶在精神分析领域广为应用,并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ogers)那里获得了常规的表述:共情是“对当事人私人世界的感受,一如那好像是你自己的世界,但又没有丢失‘好像’这一特点”(Rogers, 1989: 226)。对知青社会学人来说,唯一独特的是,共情并非对他人世界的单纯嵌入,同

³ 彼得·布劳(1918-2002),美国社会学家、社会交换论大师。曾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1973~1974)、美国科学院院士。20世纪80年代曾两度在南开大学授课,帮助重建中国社会学。

时也是对自己过往的或现在依旧继续的精神世界的再次融入。因此,他们每个人在过往 40 年里的心理蜕变都不是互为分离的单个个体的变化,而是在同一时代的经纬中交织互构而成的一种普遍的集体或社会心态。

5.3 简短的结语:大变迁时代的心理嬗变

通过 40 位社会学家尤其是其中近 30 位“知青社会学家”的口述史,我们分析了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第一代学人的集体记忆,并追溯了他们的个体心理和集体心态互为交织的双重嬗变过程。首先,沿侧重生命历程尤其是早年成长经历对成年后个体精神之影响的心理史学的路径,能够发现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 40 年中发生的林林总总的社会变迁,重构了知青社会学家的认知结构、情感世界和个体行为的现代性;其次,沿侧重社会氛围对生活期间的群体成员精神建构之影响的心态史学的路径,则能够发现这场规模宏大的社会转型,左右了知青社会学家的学术生涯和话语叙事,无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富民实践,还是遂生乐业的心态秩序,再或是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这些话语主题都充分体现出或表征了知青一代社会学家在大转型时代的集体心态。最后,通过个体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互动、群体成员间的认同,以及与他人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的共情(empathy),最终形成了知青社会学家群体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吻合的精神气质与社会心态。

参 考 文 献

- Apfelbaum, E. (2010). Halbwachs and the social properties of memory. In S. Radstone & B. Schwarz (Eds.), *Memory: histories, theories, debates* (pp.77-92).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Burawoy, M. (2000). A sociology fo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93-695.
- Burke, P. (2016).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2014*. (Y. H. Liu,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2015)
- [伯克. (2016).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2014*. (刘永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 2015 年)]
- Cai, F., Garnaut R., & Song, L. G. (2018). 40 years of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ow reform captured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R. Garnaut, L. G. Song & F. Cai (Eds.),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2018* (pp. 5-28).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Cai, H. J., Huang, Z. H., Lin, L., Zhang, M. Y., Wang, X. O., Zhu, H. J., Xie, Y. P., Yang, Y., Yang, Z. Y., & Jing, Y. M. (2020).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A literature review.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10), 1599-1618.
- [蔡华俭, 黄梓航, 林莉, 张明杨, 王潇欧, 朱慧珺, 谢怡萍, 杨盈, 杨紫嫣, 敬一鸣. (2020).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8(10), 1599-1618.]
-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21-11-17).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s centennial struggle. *People's Daily*, p5-8.
- [中共中央. (2021-11-1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人民日报*, p5-8.]
- Cohen, P. A. (1997).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rsaro, W. A. (1994). Introduction of Glen H. Elder Jr. for the Cooley-Mead award.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7(1), 1-3.
- Deng, X. P. (1994).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邓小平. (1994).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Elder, G. H. (1994).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7(1), 4-15.
- Elder, G. H. (1999).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25th anniversary ed.).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Eliason, S. R., Mortimer J. T., & Vuolo, M. (2015).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Life course structures and subjective perception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78(3), 205-227.
- Elovitz, P. H. (2018). *The making of psychohistory: Origins, controversies and pioneering contributors*. New York: Routledge.
- Fang, W. (2008). A psychology of transformation: The membership approach.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 137-147+207.
- [方文. (2008). 转型心理学: 以群体资格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 (4), 137-147.]
- Fei, X. T. (1999). *Fei Xiaotong anthology* (Vol.1-15). Beijing: Qunyan Press.
- [费孝通. (1999). *费孝通文集* (第 1-15 卷). 北京: 群言出版社.]
- Fei, X. T. (2000). A review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ology in China and my views on its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 37-51+204-205.
- [费孝通. (2000). 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 *中国社会科学*, (1), 37-51+204-205.]
- Fei, X. T. (2013).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Selected works of Fei Xiaotong in his later years* (L. L. Fang 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费孝通. (2013). 全球化与文化自觉: 费孝通晚年文选 (方李莉 编).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Forster, R. (1978). Achievements of the annales school.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1), 58-76.
- George, L. K. (1993).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ife transi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 353-373.
- Giddens, A. (1982).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Glebin, V. (2015). Cognitive style of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al-historic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thropos*, 110(2), 573-582.
- Halbwachs, M.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L. A. Coser, Tr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u, J. (2020a). Social change, marketization, and Chinese people's happiness.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1), 113-124.
- [胡洁. (2020a). 社会变迁、市场化与中国民众的幸福感. *东南学术*, (1), 113-124.]
- Hu, J. (2020b). Marketization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in

- modern China.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8 (3), 90–104.
- [胡洁. (2020b). 市场化与当代中国民众的人际信任. *社会学评论*, 8(3), 90–104.]
- Huang, Z. H., Jing, Y. M., Yu F., Gu, R. L., Zhou, X. Y., Zhang, J. X., & Cai, H. J. (2018). Increasing individualism and decreasing collectivism?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 around the globe.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11), 2068–2080.
- [黄梓航, 敬一鸣, 喻丰, 古若雷, 周欣悦, 张建新, 蔡华俭. (2018). 个人主义上升, 集体主义式微?——全球文化变迁与民众心理变化. *心理科学进展*, 26(11), 2068–2080.]
- Huang, Z. H., Wang, J. X., Su, Z., Jing, Y. M., & Cai, H. J. (2021).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its enlightenments to psychologist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12), 2246–2259.
- [黄梓航, 王俊秀, 苏展, 敬一鸣, 蔡华俭. (2021).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及其对心理学家的启示. *心理科学进展*, 29(12), 2246–2259.]
- Hutton, P. H. (1981).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The new map of cultur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20(3), 237–259.
- Inkeles, A. (1975).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Ethos*, 3(2), 323–342.
- Inkeles, A., & Smith, D. H. (1992).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X. Gu,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74)
- [英克尔斯, 史密斯. (1992).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 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 (顾昕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 1974 年)]
- Kahl, A. J. (1968). *Measurement of modernism: A study of values in Brazil and Mexico*.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Li, P. L. (1992). Another invisible ha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5), 3–17.
- [李培林. (1992).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社会结构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 (5), 3–17.]
- Loewenberg, P. (1971). The psycho-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Nazi youth cohor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5), 1457–1502.
- Lu, X. Y. (2010). Social strata structure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ince 1949.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0(3), 1–12.
- [陆学艺. (2010).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 60 年.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0(3), 1–12.]
- Mannheim, K. (1952).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 In K. Mannheim (Ed.),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30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Mayer, K. U. (2009). New direction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 413–433.
- Nanka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2019). *Sociology starts here: A compendium of early school materials of Nankai sociology*. Tianjin, China: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2019). *社会学从这里起步: 南开社会学早期办学资料简编*.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 Norenzayan, A. (2001).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2), 291–310.
- Peck, J. (1969). The roots of rhetoric: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s China watcher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1), 59–69.
- Qiu, Z. Q., & Qiao, T. Y. (2021). The innovation of e-commerce technology and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farm household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145–166+207.
- [邱泽奇, 乔天宇. (2021). 电商技术变革与农户共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 (10), 145–166+207.]
- Rogers, C. R. (1989). *The carl rogers reader*. Boston, Mas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Rosaldo, M. Z. (1984).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self and feeling. In R. A. Shweder, & R. A. LeVine (Eds.), *Culture theory: Essays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 (pp.137–15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yder, N. B. (1965).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6), 843–861.
- Sun, L. P. (2005).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new issue on sociology development.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 1–24+246.
- [孙立平. (2005). 社会转型: 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 *社会学研究*, 20(1), 1–24+246.]
- Thompson, P. (2000).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P. (2017). Changing encounters with Chinese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45(2), 96–105.
- Tucker, A. (2010). Restoration and convergence: Russia and China since 1989. In G. Lawson, C. Armbruster, & M. Cox (Eds.), *The global 1989,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lzer, H. (Ed.). (2007). *Das soziale gedächtnis: Geschichte, erinnerung, tradierung* (B. Ji, L. J. Wang, & X. K. Bai.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2001)
- [韦策 (主编). (2007). *社会记忆: 历史、回忆、传承* (季斌, 王立君, 白锡堃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 2001 年)]
- Witkin, H. A. (1967). Cognitive-style approach to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4), 233–250.
- Xu, Q., He, G. Y., & Hu, J. (2020). Marketization and change of perceptions about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hina: 2005–2015.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0(3), 88–116.
- [许琪, 贺光烨, 胡洁. (2020). 市场化与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迁: 2005–2015. *社会*, 40(3), 88–116.]
- Zhang, L. (2021).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on the re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ociology: Based on the case of “Nankai Class” In 1981. In X. H. Zhou & X. W. Zhai (Eds.), *China Studies* (No. 27, pp. 277–30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张龙. (2021). 中国社会学重建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以 1981 年“南开班”为例. 见 周晓虹, 翟学伟(编). *中国研究* (第 27 期, pp. 277–303).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Zhou, X. G., & Hou, L. (1999).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1), 12–36.
- Zhou, X. H. (1998). *Tradition and change: Social psychology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farmers and its evolution since modern time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周晓虹. (1998). *传统与变迁: 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 北京: 三联书店.]
- Zhou, X. H. (2014). Social mentality and Chinese feeling in the era of transformation: A dialogue with the paper “Social Mentality: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transitional society”. *Sociological Studies*, 29(4), 1–23+242.
- [周晓虹. (2014). 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 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 *社会学研究*, 29(4), 1–23+242.]
- Zhou, X. H. (2020).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Narrow or broad? Pseudo problem or true reality?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Xie Yu and Professor Zhai Xuewei. *Sociological Studies*, 35(1), 16–36+242–243.

[周晓虹. (2020). 社会学本土化: 狭义或广义, 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 *社会学研究*, 35(1), 16-36+242-243.]

Zhou, X. H. (2017). *Chinese feeling: Globaliz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of Chinese social mentality.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周晓虹. (2017). *中国体验: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Life course, life transition and psychological transmutation in changing times: Oral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sociologists of the “Educated Youth” generation

HU Jie¹, ZHOU Xiaohong²

(¹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²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society has undergone rapid changes towards modernization. While the chang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s have brought about remarkable economic achievements, Chinese values and social patterns have also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in 1979, as perhaps the most sensitive group to social change and its impact, the educated youth generation of sociologists has become the ideal case to represent the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era. This is because their personal life history was synchronized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well 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ology.

As 2019 mark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we have conducted our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with 40 sociologists. Through oral histories of these 40 sociologists, especially the 30 or so “Educated Youth Sociologists”, we analyze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cholars aft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and traced the dual process of transmutation in which their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collective psychology intertwine.

In the dimension 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ffected their cognitive style, emotional world and modernity in personal behavior. In ter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ntality, the discourse narratives formed during their 40-year career 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enriching the people, the psychological order of happy life and work, and the localization or sinicization of sociology fully reflect the collective mentality of this unique group in the era of great change. Further, there were many overlapping and common features between their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se made the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se sociologists a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in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collective mentality.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come widely accepted in psychology in recent years. Among these, psychobiography is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qualitative method. So far,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biography in psychology has only been conducted in relation to individuals. Based on oral histories of 40 sociologist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r collective mentality of people in the 40 years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aking the psychobiography method a step further, with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soc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amifications.

Keywords changing times, psychological history and history of mentality, life course, life transition, psychological transmutation